

孙子兵法

吴如嵩
著

浅说



解放军出版社

孙子兵法

浅说

吴如嵩 著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子兵法浅说/吴如嵩编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ISBN-7-5065-2354-X

I. 孙… I. …吴… II. 孙子兵法-注释 N.E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6519 号

书 名: 孙子兵法浅说

著 者: 吴如嵩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海军四二二九印刷厂

印刷者: 一二〇一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3 版

印 次: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 数: 20501—355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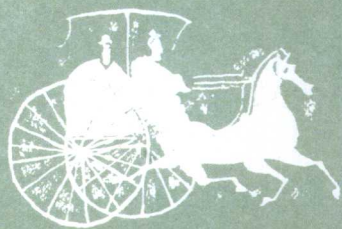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7-5065-2354-X/F·1213

定 价: 11.00 元

责任编辑：陈济康

封面设计：姜学亮

解放军出版社



目 录

一、孙武与《孙子兵法》	(1)
(一) 孙武的生平	(1)
(二) 《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	(4)
(三) 辉煌的成就	(7)
(四) 巨大的声誉	(23)
二、孙子十三篇及译文、浅说	(28)
计篇	(28)
作战篇	(40)
谋攻篇	(46)
形篇	(57)
势篇	(63)
虚实篇	(70)
军争篇	(78)
九变篇	(85)
行军篇	(90)
地形篇	(98)
九地篇	(105)
火攻篇	(115)
用间篇	(119)
三、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的现实意义	(124)
后记	

一、孙武与《孙子兵法》

（一）孙武的生平

春秋时代的齐国，位于今山东东北部，濒临渤海，有渔盐之利。在诸侯列国中是一个物产富庶、实力强盛的东方大国。公元前 685 年，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革新军政，发展生产，终于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第一个春秋时代的霸主。杰出的大军事学家孙武就诞生在这个国家里。

那是风云变幻的春秋末年。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残酷，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奴隶起义和奴隶战争的洪流，如惊涛激浪，猛烈地冲刷着奴隶制的污泥浊水，从根本上打击和动摇了奴隶主的腐朽统治，成为新社会从旧社会的母胎中诞生时的助产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了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领域等各方面的斗争。奴隶主的统治江河日下，“礼崩乐坏”。

孙武的家族，在齐国正是处于这一激烈动荡的漩涡之中。原来孙武的祖先就是齐国的田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孙武字长卿，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的后裔。公元前 672 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逃奔齐国避难。齐桓公授之以“工正”之职，管理手工业

生产。陈完后来又改姓名为田完。田氏几代之后，居然发展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同以国君为首的大批贵族相对立。到齐景公时，田完的第四代子孙田桓子已是齐国的大夫。他用大斗借粮、小斗收进的办法争取民众，使民众象流水般地归附田氏门下，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齐国在攻打莒国的一次战争中，田完的五世孙、孙武的祖父田书立了战功。齐景公便把乐安（今山东惠民县）封给田书，作为他的采邑。又赐姓孙氏，以示嘉奖。春秋时代，姓是全族的共同称号，而氏只是某一支派的称号。田书这一支即是以田为姓，而又以孙为氏的。后来姓氏不分，人们也就把孙武的氏作为他的姓了。

公元前 532 年夏季，田氏联合鲍氏，趁执政的旧贵族栾氏、高氏宴饮方酣的时候，突然包围了他们，几经激战，栾氏、高氏战败，其主要人物栾施、高强两人逃往鲁国。这就是所谓的齐国“四姓之乱”。

这种纵横捭阖的斗争，势必在客观上为孙武提供了洞察统治集团上层斗争的机会，锻炼了他善于应变的机智才能，使他受到了新兴地主阶级世界观的强烈熏陶。同时，作为军事世家的田氏家族，无疑为孙武继承和学习先人的军事典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四姓之乱”，田氏、鲍氏取得了胜利。大约就在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孙武——或许还有孙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却离开了故土齐国，踏上了新的里程，去到南方新兴的吴国。年青的孙武何曾想到，历史的舞台正等待着他扮演春秋争霸战争最后一幕的重要角色。他将在被当时视为蛮夷之邦的吴国开启一重崭新的天地。

孙武所到的吴国，即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他大约就

在都城姑苏（今苏州）附近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他一面潜心研究兵法，观察吴国政治动向；一面与他的好友伍子胥一样，过着一种半自耕农式的生活。

正当孙武在军事学上有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储备时，他施展抱负的历史契机也终于到来了。公元前516年，吴国的公子光指使勇士专诸刺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公元前512年，阖闾决心同楚国大战，但突将无前，很觉踌躇。大臣伍子胥一连七次向吴王推荐孙武是真正可以“折冲销敌”的主将人选。于是，吴王决定召见孙武。

孙武或许看到这是一次决定他政治命运的召见，便带上他那蔚为大观的兵法十三篇到吴宫晋见吴王。在回答吴王的提问时，孙武那惊世骇俗的议论，新颖独特的见解，引起了一心图霸的吴王的深刻共鸣，他连声不迭地赞誉孙武高妙的战争见解，横溢的军事才华，于是当即任命孙武为将军。

历史记载，在这次召见中，曾有孙武吴宫教战，斩吴王美姬的故事，这不过是一个军事寓言。它旨在说明，孙武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不是旨在说明“以法治军”。

孙武为将之后，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意思是说，公元前506年，吴军对楚国实行深远的战略奇袭，攻占楚国首都郢城，孙子有战功；公元前484年吴军在齐国艾陵重创齐军；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吴国取代了晋国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北威齐晋”，孙武也有不可磨灭的战功。从公元前512年任将军到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会盟，孙武在吴国有着三十年的戎马生涯。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很难作更直接、更具体的描绘。孙武最后的结局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当吴国北威

齐晋时，已是阖闾之子吴王夫差当政。夫差倒行逆施，骄奢淫逸。可以想见，孙武对于夫差这样的君主是冰炭不能相容的。据《越绝书》记载，江苏吴县东门外尚有孙武的坟墓。看来，孙武没有象伍子胥那样被杀，而很可能是飘然归隐，老死山林了吧。

（二）《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

《孙子兵法》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既后又增加了他在吴国的战争经验，从而更加完备。它问世之后，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重视和流传。《韩非子·五蠹》说：战国时候，“藏孙（孙武和孙臆）、吴（吴起）之书者家有之”。从现存汉、唐、宋古籍对《孙子兵法》的征引看，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抄本。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有文字不尽相同的甲乙两个写本。北宋时的《十家注孙子》本与《武经七书》系统的《孙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汉朝中期以前，《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独立而完整的。《史记》在孙武列传中这样写道，吴王阖闾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子兵法》残简《见吴王》中，两次提到“十三篇（篇）”，可见《史记》的记载并非虚妄之谈。

可是，西汉末年刘向《七录》则称《孙子兵法》三卷。不说“十三篇”而说“三卷”，可能是由于从简策变为帛书的缘故。而晚于《史记》一百多年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却记载为《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为什么会出出现这种篇帙激增的情况呢？

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篇骤增的原因。他说：八十二篇中，除了孙武见阖闾以前所作的

十三篇外，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传了。但是毕以邇还是从古籍中辑录到一些佚文，都收在《孙子叙录》中。他指出，这些佚文“其一为《问答》若干篇，既见闾闾所作，即诸传记所引遗文是也。一为《八阵图》，郑玄注《周礼》引之是也。一为《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俱见《隋经籍志》。又有《三十二垒经》见《唐艺文志》”。他的判断和证明是正确的。《孙子兵法》残简下编中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都是十三篇以外的佚文或者后人的注释。

恢复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汉书》六十多年后的东汉末年，才由军事家曹操亲自完成。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孙子》古本。他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在《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大概在唐以后才失传。

曹操十分重视古籍的整理，并且十分偏爱《孙子兵法》。他曾派专人协助蔡（琰）文姬回忆整理其父蔡邕所藏古籍，是人们熟知的故事。（见《后汉书》卷七十四，《列女传》）。对于《孙子兵法》，曹操是第一个进行注释的人。他在《孙子序》中以清峻的文字这样赞誉《孙子兵法》：“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意思是说，他虽然读过许多军事著作，但是，只有《孙子兵法》最为精深。其书详审的计谋、慎战的思想，明智的策略、深远的考虑，不可误解。然而一般人未能对它透彻地了解和正确地解说。同时，流行的八十二篇本的《孙子兵法》兼收并蓄，文字繁多，有失其重要的本旨，因此，他

才为之作简要的注解。

不料曹操恢复十三篇本来面目的工作，到了唐代却引起诗人杜牧的一大误会。他居然认为：孙子的书原来有十几万字，被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切”，提炼出只剩五千多字的十三篇。对于杜牧这一误会，历代史学家们大都给予批驳。例如，毕以询指出：“孙子十三篇者，出于手定，《史记》两称之，而杜牧以为魏武笔削所成，误矣。”

《续孙子兵法》六十九篇本的失传，引起了杜牧的误会，提出一个曹操删削的猜测。到了宋代，又有梅尧臣、陈振孙、叶适等一千人，公开否认《孙子兵法》是孙武所著。而且，由于《孙臆兵法》自隋朝以后失传，在清代以来的中外学者中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说孙武与孙臆是一个人的，有说《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是一本书的，有说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孙武其人的，《孙子兵法》的孙臆所作的，甚至竟有说《孙子兵法》的作者乃是曹操的，等等。这些，笼罩在《孙子兵法》头上的迷雾，终于由于《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的同时出土而大都云消雾散了。1978年7月，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西汉木简《孙子》的出土，进一步肯定了孙武确有兵法十三篇。目前，只有少数人还以《孙子兵法》中所言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以及某些军事制度方面的内容为依据，认定其书只能成书于战国中期或后期，而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末年。

是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军事上任何一种新的学说的创立，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它必须以前人留存的思想资料作为开拓新领域的起点；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吸收所处时代在军事理论上和战争实践上的成果，进行加工、改造和制作，并且无一例外地反映出所属阶级的

愿望和时代条件的限制。根据这一原理，我们认为，《孙子兵法》恰恰应当是成书于春秋末年。但是，它在流传过程中窜入了后人对某些字词的修改或补充。例如：竹书的《用间》篇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苏秦远在孙武之后，显然这是后人臆增的文字。

我们在对《孙子兵法》逐篇进行浅析时，正是把它置于春秋末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的。这就势必要从春秋时代的战争特点出发，探讨孙武对前人军事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本书不专列一章来专门探讨《孙子兵法》成书的时代背景。我以为这样便可以把《孙子兵法》的内容和当时的战争特点融合在一起来分析，便于读者理解其书。关于记载春秋时代战争的史书，最重要的便是《春秋左传》。当我们用《孙子兵法》与《春秋左传》对照时，不仅使我们看到《孙子兵法》是植根于春秋时代，也使我们加深了对《孙子兵法》文义的理解。我认为，用战例去说明军事理论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但是，切忌超越时代的、不加分析的类比。如果不注意时间、地域和性质的不同，机械地比附，那就会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因此，我在本书中没有征引现代的战例，也几乎不征引春秋以后的战例。

（三）辉煌的成就

春秋时代是一个大动乱、大改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孙武就是这个解放在军事上的杰出代表，《孙子兵法》就是这个解放在军事上的集大成之作。

恩格斯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中谈到拿破仑卓越的军事建树时指出：“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改革不能视为奇迹；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

必然产物，就如同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又说：“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在军事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1—562页）按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样可以说明春秋时代军事领域的变革和解放。当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最根本的解放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于是旧有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要发展为政治上的对抗，政治上的革命。例如，诸侯列国军制上的一系列改革，就如同其它改革一样是十分普遍而深入的。公元前645年晋国“作州兵”，废除了奴隶和平民不能充当甲士的限制；公元前594年，鲁国“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集兵役和军赋；公元前538年，郑国“作丘赋”，奴隶可以充当甲士并承担军赋；楚国、齐国也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军制的这一改革，是封建阶级在同奴隶主阶级斗争中赢得的一个重要的胜利。因为奴隶可以充当甲士，这就打破了过去只有贵族才能充当甲士的限制，从而改变了军队的士兵成分。士兵成分的改变，不仅使征兵制得以广泛推行，增加了参战部队的数量，而且在作战方法上使车战退到次要地位，使野战上升到主要地位。步兵在野战中的机动能力远远优于甲士在车战中的机动能力，因而在春秋中后期的战场，各种样式的机动作战——迂回、包围、侧击、奇袭等等，纷至沓来。宋朝胡安国《春秋提要》对春秋时代各种类型的作战有详细的统计，这里只摘数例也就可窥其全豹了。他列举出：“侵”（潜师掠境）六十例，“伐”（声罪致讨）二百十三例，“战”（两军相接）二十三例，“围”（纒其城邑）四十四例，

“入”（入其国都）二十七例，“灭”（毁其宗庙社稷）三十例，“败师”（诡道而胜）十六例，“取师”（悉虏而俘）三例，“袭”（轻行而掩）一例，“追”（已去而蹶）二例……。

诸侯列国变法图强的斗争，军制的改革，作战方式的变化，势必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上。当时，包括军事思想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社会思想的解放象潮水般地向奴隶制的传统观念冲击。法、儒、道、兵、名等各种思想流派应运而生。作为兵家的孙武，正是在新旧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中，在诸子各家的学术争鸣中，鲜明地表现出自己在军事战线上革新进步的军事思想。本篇所要谈的重点就是《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成就，然后再简要地谈谈它在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

1. 在军事上的成就

首先，在战争问题上，孙武就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武装斗争进行呐喊的。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对于这句话，如果只孤立地看，那么它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的古训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只有把他这一重视战争的思想，和他“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九变》），这一重视战争准备的思想联系起来分析，并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把握它的精神实质。

我们知道，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运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场社会革命同其它一切社会革命一样，也是要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孙武所说的战争，就是他那个时代为实现地主阶级专政而进行的

兼并战争和称霸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它是进步的战争，值得肯定的战争。列宁说过：“因为在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始终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在一切国家采取内战的形式，而没有极严重的破坏，没有恐怖，没有为了战争利益而对形式的民主实行限制，内战是不可想象的。”（《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第363页）春秋后期的兼并战争和诸侯争霸，虽然一方面使人民遭受苦难，但在总的方面却给社会带来了进步和希望，为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新兴地主阶级的兼并战争虽然不能同当时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和贵族的正义战争等量齐观，但是，它也是当时暴力革命的一部分。恩格斯说：“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孙武所主张的战争既然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战争，他所写的兵法是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而创立的新说，那么，他公开宣称的“廓地分利”、“伐大国”等等，客观上就是向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进行抗争的口号和要求。

以之与同时代其它思想家的著作相比较，更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在战争问题上的可贵价值和进步意义。早于《孙子兵法》的《老子》，对于战争则认为是“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与孙武大体同时的孔子，对于封建兼并战争的态度是十分暧昧的。例如，“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又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当然，不能认为孔子反对战争，他也明确说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不过他的阶

级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对于杀了齐简公的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成子，公开地、鲜明地表示要出兵讨伐（事见《论语·宪问》）。

当时由于战争频繁，小的诸侯国受害甚大，因此宋国的华元、向戌提出了弭兵（停止战争）的主张，并举行过几次弭兵大会。向戌自以为弭兵有功，并向子罕夸耀。子罕郑重地指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在当时，能够认识到战争从来就有，并且是一种威慑邪恶、伸张正义、保国安民的工具，无疑是可贵的。孙武在战争问题上，正是和子罕一样的“主战派”。这一主战思想，到了战国就发展为吴起、孙臆、韩非等人的封建统一战争的主张。

其次，要谈到孙武关于军队建设的问题。

关于军队建设，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既讲过军事训练（“士卒孰练”《计篇》），也讲过“爱卒”、“善俘”（见《地形》、《作战》）；既讲过“信赏”（“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作战》），也讲过“明罚”（“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孙武在治军方面的重要主张。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孙武在军队建设上的着眼点，主要的不是关于士卒的军事训练和管理教育，而是选拔将帅的新的标准，这从其在十三篇所占的分量中便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奴隶主阶级的军队还是新兴封建主的军队，它都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负有对内镇压、对外抵御或进攻的职能。因此，从有甲骨文字记载的商朝开始，奴隶主阶级就要求对军

队进行严格的训练，如“庠射”一词，指的就是教习射艺。在战争中也向奴隶们公开宣告：有功者赏，畏敌、逃跑者杀。例如，商汤伐桀的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战，商汤在战前动员时说：“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尚书·汤誓》）意思是说，倘若士兵们努力作战，他就奖赏，说到做到；如果谁作战不力，他就连同其妻室儿女全都杀掉，一个也不赦免。

由此可见，我们要评价孙武在治军问题上的建树，不能仅仅从一般意义上去考察，否则就无法分清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在军队建设上的根本区别所在。商周以来，军队控制在王室和诸侯国君手里，军队的基干都是其宗教或家族的成员。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奴隶主贵族的没落，各国开始实行官吏的任免制度，逐渐废弃世卿世禄制度。其中官吏的一个来源便是立有军功的庶人工商。这就突破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垄断官职的现象。

孙武的建军思想正是适应这一历史趋势的，为了使新兴地主阶级在军队中形成自己的官吏队伍，他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选拔将帅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计篇》）。这五条标准是同世卿世禄、论资排辈的奴隶主阶级的选将标准针锋相对的。对于废除在军队中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促进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这五条标准是孙武关于治军问题的着眼点。《孙子兵法》中关于教育训练赏罚等各方面的论述，都是这五条标准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再次，我们要谈到孙武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主要贡献。

《孙子兵法》十三篇，可以说它每一篇都是讲的战略战术，而对于上面说到的战争观与治军，它并没有专门的篇章去论